

大家西学

公共性二十讲

谭安奎编

公共性与私密性虽非一荣俱荣，却一损俱损

Publicity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家西学

Publicity

公共性二十讲

谭安奎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共性二十讲 / 谭安奎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12

(大家西学)

ISBN 978 - 7 - 201 - 05822 - 1

I. 公… II. 谭… III. 公共管理—研究—西方国家
IV. D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03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公共性二十讲

编 者 谭安奎

责任编辑 李 晶

丛书编辑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2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822 - 1

定 价 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我们对于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包括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什么“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年7月于北京美丽园

编者序

谭安奎

公共性 (publicity) 是西方哲学与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对它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但从各类西方的辞典、百科全书来看，对于这个概念的处理，要么是付之阙如，要么是寥寥数语。或许部分原因在于，如果放眼整个西方思想史，“公共性”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仍然鲜活有力的“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发挥其影响。一种观念无疑比一个概念更多现实感，也更多模糊性。考虑到这一丛书着眼于“观念”的旨趣，我们在这里也并不打算提出一个精确的关于公共性的概念界定，而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提炼出公共性观念可能包含的一些指向。

公共性显然是与私人性、个人性、私密性等概念相对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某种事物与公众、共同体（集体）相关联的一些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性观念可以包括以下一些维度，（一）空间：一种特定的领域，公共生活在其中得以展开，这种领域可以是动态的，也可以是相对静态的。（二）实体：一种实体化的、静态的共同体，由此可以引申至国家乃至全球的层面。（三）主体：与公共性相关的行为主体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作为集合体的公众。在此基础上，公共性还涉及公众的利益或曰公共利益，以及这种利益的识别与供给。与此相关，在事物的归属上，尤其是在政治权力的归属上，公共性强调权力为公众所有，进而，这种权力在行使上还要为全体公众而不是为部分人服务，并且关注社会公正。第二种主体就是与私人相对应的公民，因为自古以来，典型的公共政治生活就是以公民身份为前提的。（四）情操：公共性对公共领域中的行为主体提出了特定的德性上的要求，即公民美德或公共精神，包括对国家的情感与态度。（五）过程：公共性意味着与私密性相对应的公共参与、公开讨论的行动过程与言说方式。通过上述这些维度，我们就可望从结构与主体、态度与行动相结合的角度设想一种公共性的观念框架。此外，对公共性观念的讨论，还需要澄清它与私人生活、私人领域、个人信念的对比，这种对比因而也是本书在材料选择上的一个重要考量。

公共性观念常常与民主、共和制度密切相连，因为正是这样的制度为公共性的上述各个维度提供了展示自身的平台。当然，反过来说，公共性的观念也为人们建立这样的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西方历史上，公共性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时代无疑是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的共和国时期，那是一个重视公民身份与公共生活的年代，人们将其视为良善生活的本质内容，甚至从本性上把人看作是政治动物。如果以那时候的公共性观念及其实践来衡量的话，西方的公共性确实是逐渐弱化了。随着城邦的解体以及帝国的建立，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开始暗淡，安身立命的个人伦理问题日渐突出，在中世纪则表现为灵魂拯救的至高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型城市共和国的短暂繁荣曾推动了公共性观念的复兴。启蒙运动时期，更多的关注似乎在于为政治安排与人们的日常行为寻找经得起公开辩护的理由，也就是建立一个“理性的法庭”。近代以来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生活中的自由与利益，而不是公共生活的价值。当然，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它同时试图为人们的公共参与、公开讨论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从而

以新的公共领域模式在有限的意义上发展了公共性观念。在公共利益方面，它也更为强调私人利益的追求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繁荣的正面意义，而国家则仅限于提供基本的法律秩序和其他公共物品。当然，这种社会模式引发了重大的社会不公与阶级对立，从而促进人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设想在消除阶级对立、国家乃至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真实的共同体”，让每一个人都得到自由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将此理解为建立真正的、最具普遍意义的公共性。

本书所选文献是按照作者的出生时间顺序排列的，但篇名多为编者自己所拟定。下面简要说明一下本书所选文献的情况。

第一讲是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但政治家不同于家长，城邦也不可整齐划一》，相对冗长的篇名是为了概括他的基本思想。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阐述了“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古典命题，建立了公共政治生活与人的本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他其实还揭示了城邦的本性，也就是政治生活的本性：它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份为前提，所以政治家与家长不一样；无论是否可能，都不应当在城邦中追求整齐划一，换言之，城邦必须有对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因此，至少从一个理想的角度来看，发达的公共领域与充满活力的私人领域之间是可以而且应当共存的。亚氏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反省政治生活与良善生活（good life）之间的关系，而对于恰当地理解公共政治生活的本质，或许也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第二讲是西塞罗的《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同财产》，他以对话体的形式表明，国家权力的归属应当具有公共性，意即应当为全体人民所有，这是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种公共性的主要体现就是一种混合的政体，一种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这里是指古代所说的纯粹的民主制，即平民政治，它常常被当作是暴民政治，不顾及君主和贵族的利益）的原则与优势于一体的、温和平衡的政体。混合政体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它让不同的阶级、阶层都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据一定的地

位。除了在权力的归属上体现共和国的公共性价值之外，它同时也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无论是在公共性的价值方面，还是在相应的政体设计的智慧方面，西塞罗的作品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三讲是普鲁塔克的《好公民伽图》。伽图作为一个古典公民美德的典型代表，可以部分地表明公共生活中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德性。在他生活的时代，其演说的技巧、对政治荣誉的追求、淳朴之风与自我克制、对服务于公众事业的热忱，都被人们引为楷模广为传谈。当然，从这篇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古典的公共领域确实存在无限扩展和蚕食私人生活的危险性。伽图所担任的监察官的职位说明了这一点，它是我们反思古典公共性观念的一个生动的材料。

第四讲是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私恶与公益》。这篇著名诗作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础上，表面上看确实缺少公共性的观念。它认为人们各自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冲动却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繁荣，若要与这种人性作对，实行一种高调的道德，结果反而导致萧条。但是，这其中所隐含的“私恶即公益”的观点代表了对公共利益的形成机制的一种独特看法，这种看法构成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立场。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们思考私人性和公共性之关系的一个重要参照，虽然其意义更多地只在经济方面。

第五讲是孟德斯鸠的《共和国与公民美德》。孟德斯鸠广泛探讨了各种政体的动力原则，而共和政体的原则就是政治品德，即热爱祖国和法律、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们似乎更多地在强调制度的设计，而对人的德性则不寄太大的希望。孟德斯鸠无疑关心制度，其“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即是最好的体现。但其思想的独特魅力也体现在他对公民德行的重视上，这对越来越强调公共制度建设的我们而言，无疑构成另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六讲是卢梭的《公意与公民精神》。卢梭设想一种社会契约，其实质就是每个结合者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接受公

意的指导，由此形成一个具有公共人格的共和国。公意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在共和国中，公民必须具有公共精神，亲自参与公共事务，而不是委托代表，这既是幸福的源泉，也是自由的唯一途径。文中关于“强迫自由”的观点常遭后人诟病，但卢梭的思想却几乎是在最全面的意义上展示了公共性的含义所在。

第七讲是康德的《理性的公开运用》。康德在论及启蒙的时候提出，促进公众启蒙的唯一条件只是给他们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种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就好比是以学者的身份（而非某种公职岗位的占据者）对公众发表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它意味着可以自由争辩，而不是消极地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进行公共推理，以求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而不是预设任何权威。理性的公开运用实际上与言论自由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自由乃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典型特征，康德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这种自由与启蒙和人类进步联结在一起。

第八讲是麦迪逊的《党派斗争与公共利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党派纷争一直被认为有损于公共利益，从而广受怀疑。麦迪逊认为，党争起于自由以及人的多样性，如若认为自由是重要的，党争自是不可消除。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消除党争的影响，而他所提出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大的共和国，因为它可以包罗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多数形成侵犯他人的共同动机的可能性就越小，要采取一致的行动也就更难。麦迪逊一反前人关于共和国只能在狭小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的传统观点，认为共和政体可以在一个广袤的国家内实现，同时公共利益在党派利益的相互牵制中仍能得到维护，这些都是对现代政治的理论贡献。

第九讲是黑格尔的《国家不能等同于市民社会》。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公共性观念时必须说明的问题。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关系是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关系又体现在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说明上。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以特殊性为主的领域，其中，人人都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相反，国家所代表的乃是普遍性的东西，人们结合在一起在国家内生活，这是一种伦理

上的规定，而不是任意的事情。但国家要尊重市民社会，尊重特殊性的发展，因此黑格尔所强调的乃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性观念。既区分，又包容，这是黑格尔理论的价值所在。

第十讲是托克维尔的《公共参与和爱国主义》。托克维尔在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美国公共参与的制度、精神以及由公共参与的实践所衍生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这种公共精神体现了美国人对政治自由的追求，让他们克服了一盘散沙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弊端。他认为，使人人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这在现代社会是使人人都能关心自己祖国命运的唯一手段。公共精神对克服现代社会弊病的意义，以及它与某种形式的爱国主义之间的关联性，这大概是托克维尔思想中最富启发性的地方。

第十一讲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把资本变为公共财产，让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政治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国家与公共权力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唯有消灭阶级差别，把资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才能让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从而也就是实现最普遍的公共性。这是《共产党宣言》所宣誓的目标，它把共同体与个人自由发展完美统一理想具有强烈的道德吸引力。

第十二讲是恩格斯的《“理性的法庭”与“真正人的道德”》。启蒙思想家试图用理性的标准为社会安排与人们的行动提供普遍的理由，恩格斯称此为建立“理性的法庭”。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也和启蒙思想家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恩格斯认为，他们都停留于观念的领域，没有认识到道德、善恶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相关性。恩格斯的结论是，只有消灭了阶级对立，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超越阶级对立的“真正人的道德”。显然，唯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找到真正为所有人共享的道德理由。

第十三讲是威尔逊的《政府既要为权贵效劳，也要为地位低下者服务》。美国总统威尔逊所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强调社会公正的时代，他本

人就是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政府要做整个人民的代言人，不但要为权贵服务，也要为地位低下者服务。这种观点虽然平实，但可以体现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及服务对象方面的公共性，也可以说是真正“民享”的一面，这与此前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是不一样的。

第十四讲是韦伯的《个人信念与公共责任》。韦伯认为，在多元主义的时代，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但至于事业本身是什么，却属于信仰问题。但政治作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它涉及到许多人和许多因素，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因此政治家的行动不可单以个人信念为出发点，而是应当充分考虑行动的可能后果，并采取对后果负责的态度。当然，一个政治家考虑到种种因素，并坚定地实行某种行动的时候，在他身上便体现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结合，这就是韦伯心目中堪担政治使命的人。韦伯对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以及对二者间关系的讨论，是我们理解公共领域的伦理特殊性的必读材料。

第十五讲是奥威尔的《“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一九八四》这部政治讽刺小说中，奥威尔描写了一种处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之下，外在自由连同思想乃至最具私密性和自发性的个人感受都渐渐枯萎。主人公试图保持自己的人性和内心力量的希望也在全面改造之下归于破灭，最后“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了体制，以及那些原本不合常识的荒唐信念。这是公共权力无限扩展的极端后果，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双重毁灭。这种非人的、看似矛盾的结局让我们思考，公共性与私人性是否应该在一个恰当的界线之内相互依存。

第十六讲是阿伦特的《公共政治生活：行动、言语与自由》。阿伦特是公共领域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因其特殊的政治思想倾向而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的女儿”。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家庭与城邦的分离，它们分别代表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而且是严格区分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行动的领域，它以言语、劝服而非暴力